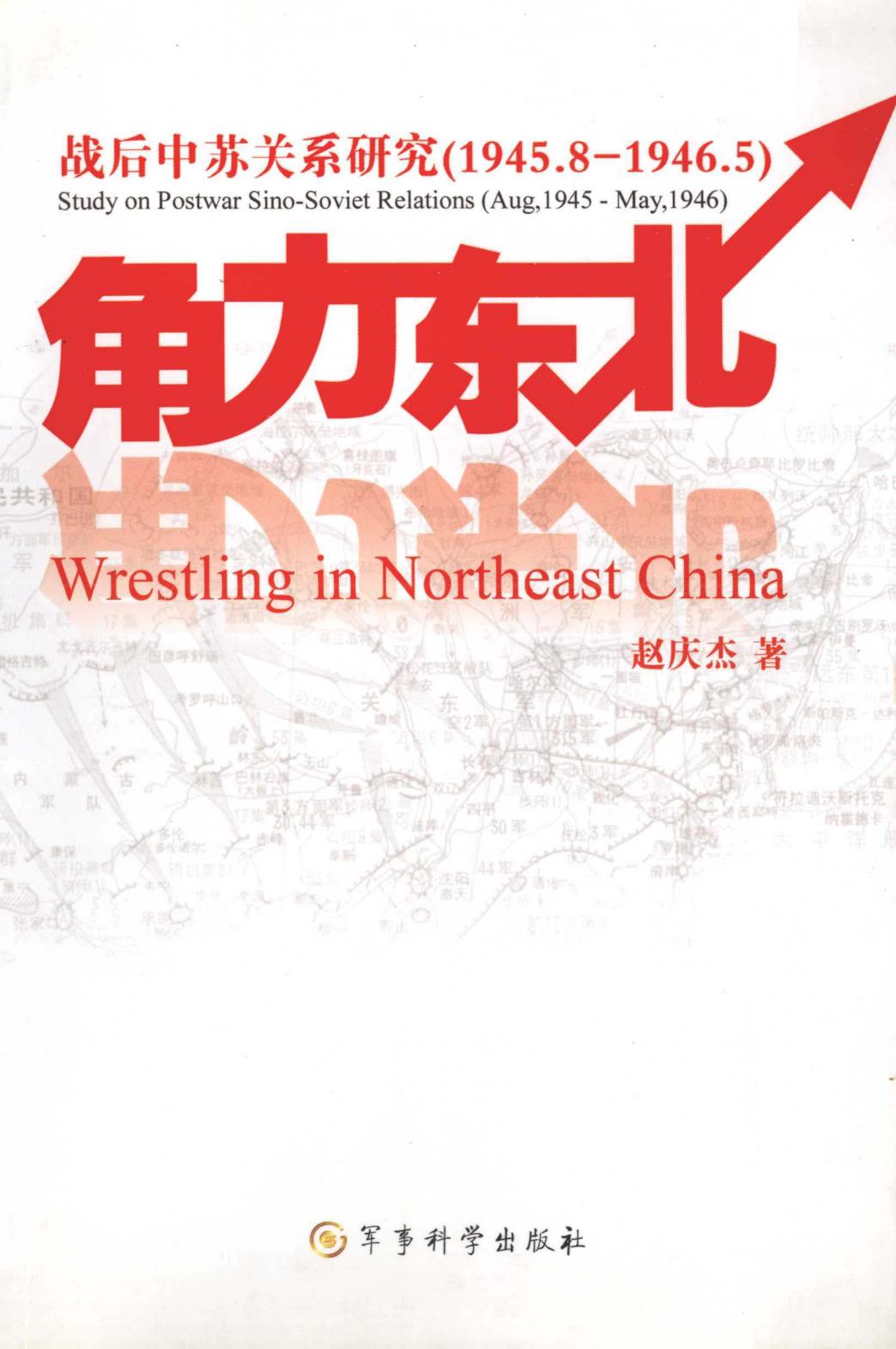


## 战后中苏关系研究(1945.8-1946.5)

## Study on Postwar Sino-Soviet Relations (Aug,1945 - May,1946)

# 东北角力

赵庆杰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内发行  
不得外传

# 角力东北：战后中苏关系研究

(1945年8月~1946年5月)

Wrestling in Northeast China  
Study on Postwar Sino – Soviet Relations  
( Aug, 1945 – May, 1946 )

赵庆杰 著

敬语 沈志华  
李开复  
孙晓东  
赵庆杰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1.6.19

於北京

(京)新登字122号

---

书名：角力东北——战后中苏关系研究（1945.8—1946.5）

---

著者：赵庆杰

责任编辑：潘宏

封面设计：冬子 孙鑫宇

统一书号：580237 · 596

字数：210千字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金星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军事科学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邮编：100091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 魏宏通

赵君庆杰的新著《角力东北：战后中苏关系研究》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经过数年认真修改和充实完成的。

1945 年 8 月 ~1946 年 5 月间，在中国东北，三国（中国、苏联、美国）四方（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苏联、美国）展开了一场引起世界关注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外交角力，为战后东亚格局的确立铺就了基础。

从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进兵东北对日作战开始，截至 1946 年 5 月 22 日苏联军队撤出东北，时间跨度仅 10 个月又 13 天，而东亚战后格局已见端倪。苏联与美国进行的是非接触式对抗，双方都在国际舆论和中国两方力量间谨慎地维护着各自在东北地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共两党的力量经受着外来势力的干扰和调整，中共在东北地区得以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为最终夺取全国的解放打下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一切利权得以回归祖国。中国东北地区由此也成为东亚冷战的滥觞。这段历史在中苏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的冷战史过去，由于外交档案资料的限制，诸多问题难以深入。苏联解体后，部分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使这一研究再现生机，一些没有定论的问题，佐以历史档案，史实得以廓清，进而可以开展理论的分析和判断了。

在书中，赵君运用了综合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新的理论拓展：

一、此前由于史料限制，中苏“经济合作”过程和 1945 年底蒋经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秘密会谈两个问题，基本尚无研究者进行过系统梳理。赵君谙俄语，借助解密档案资料，对此做了尽可能详尽的记

述和补记，并将这两个问题与“撤军之争”、“战利品之争”的混杂关系剥离开，从而分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利益取向。

二、以当今国际政治学中有较广泛影响的均势理论为依据，说明战后东北问题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以国共两党激烈争夺东北、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为表征，以美苏走向冷战、东亚战略格局出现两大阵营意识凸显为结果的一种不平衡之上的相对平衡态势。从世界史观角度，判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膨胀起来的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与斯大林本土安全意识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是一种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战略动因。

三、运用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对《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条款中与战后东北问题紧密相关的“战利品”问题、“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再评价和再思考。这样跨学科的法理思考，我感到难能可贵，对我们深入思考宏观背景中的历史问题很有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苏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深感兴趣的课题。从赵君采用的资料和论述来看，翔实充分，立论有据，表述精当，为上乘之作。著名史学家郑德荣、金普森等先生均将其博士论文评阅为优秀论文。赵君没有局限于一般的历史考证与陈述，而是运用夹叙夹议的方式，以可信的史料加以论证，进行说理与评述，在澄清历史过程的前提下得出理性认识，为当代人提供了历史启示。这是应该肯定和提倡的研究方法和态度。

按我国传统说法，赵君是我的“关门弟子”。对他的学术发展，我始终寄予热望。读书期间他就表现出很强的科研能力，外语兼通英、俄语，上进心强，重视实践，学风正派，注重磨砺学术修养。现在，刚刚跨进不惑之年，正值年富力强，思维活跃，视野渐宽，我在这里期待他能拿出更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并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庆杰君对此言当常思常新。

是为序。

2010年10月19日  
于南开大学西南村锲斋

# 序

顾德欣

赵庆杰同志的专著《角力东北：战后中苏关系研究》付梓之际，我很高兴，在这里说上几句。

我与庆杰相识在他到部队院校工作后不久的一次由我主持的学术会议上。面对会场中的这张新面孔，我临时点了他当场发言。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即兴回答得条分缕析，中规中矩，又不乏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很满意。后来还曾计划将他调到我们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来任教，人为原因未得实施，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遗憾。

但是，由此以后，我多了一个真诚的“忘年交”。在学术上，庆杰参与了多个由我主持的军内外重点课题，完成的质量可圈可点；在工作中，他每遇到难题或抉择之事，都主动与我详细沟通，我也乐于为他出谋划策。作为地方重点大学的博士在入伍之后，我感到，不论是在学术方向转型上，还是适应军旅生活的认知实践中，他还是能比较快地进入角色的，很勤勉，很踏实，很多时候干得还是风生水起的。小酌间，我们畅谈国家安全利益的顶层设计问题；行旅中，探讨单反相机的光圈控制技巧；书桌旁，品评我的历年诗作和藏石心得；会议上，言辞交锋、观点碰撞、材料印证、互有启发。我欣喜地看到庆杰在工作中渐渐成长起来，渐渐摒除了“书生气”，平添了很多英武气，他不避庶务，隐忍自度，克己谦逊，兼达有为。

这本新著是庆杰对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反复修改而完成的。他跳出了传统的治史方法，从世界史观的角度，运用国际法基本原理分析了纠结复杂的战后东北问题，提出的三个“历史考察中的结论”有理有力，让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亚格局的‘三国四方’”

关系的演进终于为冷战在亚洲的开始铺就了基础”。

“苏联在‘三国四方’的外交斗争中，对于中共始终是作为自己战略全局中的“拱卫式”力量所使用的，共同的意识形态的趋近并没有成为彼此信任合作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各种援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苏联出于战略目的援助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意识形态凸显强烈的东亚地区，为‘红色’做出了最为显性的辅彩。”看完这一段，我感受到了一位正直的年轻学人对祖国的挚爱情怀和一位共和国军官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战后东北问题，本身就有深刻的学术意义和非常的理论价值，我希望庆杰的专著出版后，也要继续关注这个问题，不断用新的外交解密档案进一步多方位地勾勒出东北问题的具体演进过程，丰富冷战史的研究基础。

2002年5月，我在东北考察调研，登上珍宝岛时，曾口占五言一首，附在这里，与庆杰共勉：

呐喊声犹在，宝岛独自横。  
雷场向沧浪，剑锋护国门。

2010年11月下旬  
于京西玉泉路书房

# 目 录

绪 论 .....	(1)
一、研究意义 .....	(1)
二、学术史的回顾 .....	(2)
三、写作的基本思路 .....	(5)
<b>第一章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 .....</b>	<b>(7)</b>
一、苏联出兵中国的准备 .....	(7)
(一) 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防御态势 .....	(7)
(二) 秘密进行中的苏军大运兵 .....	(13)
二、苏军进占中国东北 .....	(18)
(一) 苏联对日宣战 .....	(18)
(二) 苏军进军中国东北 .....	(23)
<b>第二章 苏军控制中国东北及其与国民政府的关系 .....</b>	<b>(32)</b>
一、苏军撤军之争 .....	(32)
(一) 苏军撤军计划的第一次变动 .....	(32)
(二) 苏联撤军计划的一再变动 .....	(43)
(三) 苏军延迟撤军原因分析 .....	(52)
二、“战利品”之争 .....	(56)
(一) “战利品”问题的提出 .....	(56)
(二) 围绕“战利品”问题的激烈争论 .....	(61)
(三) 苏军大规模拆运东北工矿设备 .....	(65)
(四) 国内外对“战利品”问题的反应 .....	(68)
(五) “战利品”问题分析 .....	(71)
三、中苏“经济合作”之交涉 .....	(74)
(一) 中苏“经济合作”意见的提出 .....	(74)
(二) 苏方的要求与中方的应对方案 .....	(78)

(三) 经济合作谈判的进展 .....	(83)
(四) 再陷僵局 .....	(96)
(五) 无果而终 .....	(104)
(六) 关于中苏“经济合作”问题的分析 .....	(108)
<b>四、蒋经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 .....</b>	<b>(111)</b>
(一) 从莫斯科绝密档案说起 .....	(111)
(二)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 .....	(114)
(三) 蒋经国与斯大林的第二次会谈 .....	(121)
(四) 对蒋经国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评析 .....	(125)
<b>第三章 苏联占领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b>	<b>(129)</b>
<b>一、苏军占据东北与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策略 .....</b>	<b>(129)</b>
(一)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	(129)
(二) 并非融洽的初次接触 .....	(135)
(三) 延安的客人与“千载一时之机” .....	(141)
(四)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决策及与苏联的关系 .....	(146)
<b>二、苏军与中共军队关系的一波三折 .....</b>	<b>(153)</b>
(一) “独占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与苏联的态度 .....	(153)
(二) 国共和战与苏联 .....	(162)
<b>第四章 历史考察中的结论 .....</b>	<b>(169)</b>
<b>一、现实利益：美苏合作的不稳固的基础 .....</b>	<b>(170)</b>
<b>二、战略动因：苏联出兵东北 .....</b>	<b>(180)</b>
<b>三、历史变因：国共力量在中国东北的消长 .....</b>	<b>(188)</b>
<b>主要参考文献 .....</b>	<b>(194)</b>
<b>ABSTRACT .....</b>	<b>(207)</b>
<b>后记 .....</b>	<b>(211)</b>

# 绪 论

## 一、研究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问题的《雅尔塔协定》和以此为蓝本在莫斯科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世界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两个外交文件。这两个文件的签署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大事，更是共产国际解散以后，研究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冷战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1945 年 8 月 ~ 1946 年 5 月间在中国东北，三国（中国、苏联、美国）四方（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苏联、美国）展开了一场引起世界关注的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外交角力，为战后东亚格局的确立铺就了基础。在东北地区展开的这一场波澜壮阔的“三国四方”角逐争利战，是我们对战后中苏关系进行历史考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视点和理论契合点。

苏联出兵中国对日作战直接导致了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迅速覆亡，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意义不可低估。之后，就在中国东北，从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进兵东北对日作战开始，截至 1946 年 5 月 22 日苏联军队撤出东北，仅 10 个月又 13 天的时间跨度里，事关东亚战后格局走向的角逐就展开了。苏联与美国进行着非接触式的对抗，双方都在国际舆论和中国两方力量间谨慎地维护着各自在东北地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共两党的力量经受着外来势力的各种调整与干扰，中共在东北地区最终得以立足，并取得长足发展，为最终夺取全国的解放打下了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也成为东亚冷战的滥觞。

这段历史是中苏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部分，也是冷战史研究的起

点。过去，由于外交档案资料的限制，很多问题不能深入研究下去。苏联解体后，部分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使这一研究再现生机，一些没有定论的问题，就可以佐以历史档案进行史实的廓清，进而开展理论的分析和判断了。

## 二、学术史的回顾

苏联解体后，随着大量的原苏联档案的解密，对冷战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冷战初期阶段的研究热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升温，特别是战后东北地区的中苏关系、美苏关系、国共关系对整个东亚的影响诸问题，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学术方家投以关注。

在俄罗斯，以列多夫斯基和齐赫文斯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研究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不再受到现实政治的左右，他们依据便捷的档案资料，偏重于苏联对华政策的内幕研究。美国和欧洲一些学者则注重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联合编辑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尤为学界注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已与中央党史研究室将此文件集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为题翻译整理出版。德国学者 Dieter Heinzig 所著《1945～1950 年间苏联与中共关系》于 1998 年在德国出版。这本书着重于党际关系的研究，在西方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y Review）就此书先后两期发表 5 篇书评。2001 年，中国学者张文武等将此书译成中文，以《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为题在新华出版社出版。日本学者西村成雄，1997 年发表论文《雅尔塔密约对国民政府的冲击与接收东北》以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为观察点进行研讨，个别的日文资料与苏联档案资料不相吻合。

对于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台湾学者没有脱离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梁敬𬭚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侧重于反思与检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的研究模式。台湾青年学者陈立文在 1992 年出版的《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和大陆学者杨奎松 1997 年 3 月在台湾出版《中国与莫斯

科的关系（1920～1960）》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两本书更以史料的丰富见长。

国内的一批学者对于这个课题，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突破性研究，特别是对《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的影响，作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8年6月和1990年6月分别在长春和天津召开了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均以“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为主题。会后，《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编发了两辑增刊3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由于未能利用苏联解密档案，而在一些观点上说服力并不是很强。此后，以沈志华、李丹慧为代表的大陆学者，比较充分地运用了苏联新解密档案，以“冷战年代的中国与世界”为总题目，做了很多尝试性的理论探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中苏条约与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9期）两篇文章很有代表性。

1999年后，运用苏联解密档案国内出版了有关中苏关系史的几部专著，研究的时间跨度一般都相对较长，内容也相对宽泛，对战后东北问题都有所涉及。代表性成果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苏关系始末》（孙其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苏关系史（1945～1949）》（薛衍天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92年以来，关于战后东北地区问题理论分析的基本观点主要有两种。这两种评价有共性，也有差异。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北问题的历史走向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积极方面主要表现在：1、根据中苏条约，苏联对日宣战和出兵东北，大大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帮助中国尽快地收复东北；2、苏军先机进入东北并控制东北，阻止了美国插手东北，滞缓了国民党抢占东北，在客观上有助于东北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不管苏军的主观愿望如何，只要它不对中国革命力量采取敌视态度，形势就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的战略意图。

的实现。其消极方面表现在：1、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苏联对日宣战是以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为条件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影响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协定和条约还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的完整，使苏联在中国东北获得了大量权益。苏联从东北撤退时，作为赔偿而拆卸了大量的工业设备，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2、根据中苏条约，苏联政府表示只支持和援助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不支持共产党，应允将东北主权统交给国民政府接收。虽然从国家关系的角度去衡量，无可指责，却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内的斗争，使蒋介石更顽固地坚持内战和独裁方针，使中共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削弱，并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不利于反对国民党独裁和内战的斗争。

第二种观点认为，东北问题的历史走向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这种观点不否认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对尽快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中国抗日战争和促进人类和平的早日实现都起了巨大作用。但特别强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人民来说弊多利少，后果严重。其理由之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对东北经济的恢复造成了严重困难。按照条约规定，苏联取得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半所有权、经营权、人事上的控制权以及经济上单方面的优惠权益；大连港实际成为由苏联控制并为其服务的“自由港”，旅顺口实际上成为苏联的海军基地。这些几乎都是沙皇俄国在东北特权的翻版。苏联依约“合法”取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仅拆走的物资就折合约 8.58 亿美元，中国全部损失的重建费用多达 20 亿美元。理由之二，从客观后果看，中苏条约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限制作用。苏联依据条约协助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并应国民政府的要求延期撤军，在客观上对国民党抢占抗战胜利果实起着配合作用。理由之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违反国际法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理由之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经济上排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大量援助的可能性，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基本没有向中国共产

党提供实际经济援助，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主要是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而最终赢得全国解放。

### 三、写作的基本思路

综观国内外对战后东北问题的研究，侧重的方向各有不同。或是偏重于长时段的党际关系的研究，或是认定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诸般所作所为皆以斯大林的狭隘民族利益和大国沙文主义为出发点，或是研究视角囿于中苏国家关系。这样的研究，都不可能比较客观地还原当时中国东北地区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情况。我们必须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国东北地区“三国四方”复杂关系的演变，正处在美苏之间的关系从合作向冷战转变之际，因而，这一演变就成为美苏之间非直接的较量在远东地区的第一次预演，是雅尔塔体系在远东地区基本确立的明显标志。所以，对战后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走向的研究必须从大的历史视野进行考察。

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先廓清史实，在中、美、苏三方相关档案资料的广泛对照印证中，依据“论从史出”原则，理性地综合分析评价。第一章主要围绕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问题，详尽地记述历史经过。第二章围绕战后东北问题，就苏联与中国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第三章围绕战后东北问题就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行论述。第四章就战后东北问题中的几个焦点问题展开探讨。围绕美苏关系在战后的利益变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战略动因和国共力量在东北的消长等，展开论证，提出个人见解。各章节均依据档案资料和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日记或回忆）先详尽地梳理历史演进的具体过程，在此基础上，再运用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进行历史评析。

作者自小在大连长大，常常听长者谈及关于苏联红军在东北所作所为的闪烁之词和迥异于传统历史教材上的评价，出于习史者惯有的好奇心，遂下决心去探求一下这段历史的本原。博士生学习阶段伊始，作者有幸跟随王永祥先生投入《雅尔塔协定与中苏、日苏关系研究》这一课题，初涉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并选择这个国际关系

史研究中的“显学”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蒙魏宏运先生悉心指导，遂得以坚持始终，有所收获。

这个题目，对我来说，难度之大、困难之多、压力之迫，难以意料，难以尽言。既有语言条件的束缚——浅习俄文，文法粗通；又有对新史料发现的迟滞和甄别能力的欠缺，也存在着对国际政治理论中一些精义的把握不当。但最终，依靠王永祥先生在国外已经搜集到的和在国内交换的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和原始材料，在前辈学人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经魏宏运先生不断点化我的“锲而不舍”精神，论文终得方家美誉。

本书或有创新处聊可欣慰：第一，中苏“经济合作”的过程和1945年底蒋经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秘密会谈两个问题，此前基本上没有研究者进行过系统梳理。作者运用解密档案资料，详加记述，并将此与“撤军之争”、“战利品之争”的混杂关系剥离开，从战略视角分析了苏联对华政策的利益取向。

第二，依据国际政治学中的均势理论，说明战后东北问题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以国共两党激烈争夺东北、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为表征，以美苏走向冷战、东亚战略格局出现两大阵营意识凸显为结果的一种不平衡之上的相对平衡态势。从世界史观角度，判定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膨胀起来的支配世界的“全球主义”与斯大林本土安全意识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是一种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的战略动因。

第三，对《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条款中与战后东北问题紧密相关之“战利品”问题、“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国际法理考究。

# 第一章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 对日作战

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是经过从德黑兰会议再到雅尔塔会议而确定下来的。到1945年7月，当美、英、苏三国首脑再度聚会、举行波茨坦会议时，虽然在对待苏联对日参战问题上美英首脑曾经产生新的想法，力图尽量抑制苏联参与远东事务，但其时，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在这种形势下，参战与否，已经不取决于美英而主要取决于苏联的意志了。

苏联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在1945年春即着手进行，而在欧洲战场对德作战任务结束之后，苏方更加紧了在远东的部署。在横跨欧亚长达上万公里的运输线上，秘密进行的苏军大运兵，使在远东的苏日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方所采取的防御态势已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对盟国代表正式讲过，苏联发起对日进攻的时间拟在1945年8月的下半月，而确定这一时间的主要考虑之一，在于中苏条约签订的时间进程。但在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连续投掷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失败进程的情况下，在中苏间的条约并未签署之时，苏联就于8月8日正式对日宣战，并命令苏军于8月9日清晨开始了在远东的对日作战。之后，百万苏军迅速越过中苏边境，向中国东北等地推进。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迅速覆亡。

## 一、苏联出兵中国的准备

### (一) 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防御态势

关东军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战略总预备队。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关东军共拥有14个师团，1个骑兵旅团，13

个国境守备队，8个独立守备队，2个装甲战车团，以及各种炮兵、通讯兵等直属部队和大量兵站后勤部队，总兵力已达85万人，号称“百万精卫”。其中，装备精良的炮兵占日本军队全部炮兵部队的70%，航空兵多达25个飞行站队（约71个飞行中队），拥有作战飞机1025架<sup>①</sup>。这个时期也是关东军力量的鼎盛时期。

在中国东北建立和保有这样一支兵员庞大、装备精锐的部队，日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防卫满洲”，而是为了把东北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基地。对日本而言，中国东北的战略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向南可以侵略整个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向北可以攻击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在关东军的作战计划中，始终都把苏联作为它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对苏联一直采取进攻的态势。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由于战线过长，日本的对苏进攻战略才发生变化。但是，关东军的这一作战目标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暂时由对苏进攻转为对苏防御。

关东军最初制定的对苏作战计划是：把部队主力部署在大、小兴安岭和完达山的外侧，占据有利地势。一旦日苏开战，日军就在正东、正北两个方向同时发动攻势，压制和摧毁苏联远东的海、空军基地，使苏联丧失进攻的能力<sup>②</sup>。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全力开始实行南下计划，关东军的使命也发生转变。大本营给关东军的指令是尽量防止对苏战争爆发，“应当保持北方的平静”<sup>③</sup>。此后，由于苏联在对德战场上逐渐扭转了颓势，并频频告捷，日本已难以实现“北攻苏联、占领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梦想。关东军总司令部设想，苏联一旦发动对日

---

<sup>①</sup> 参见孟宪章等：《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sup>②</sup> 同上，第69~70页。

<sup>③</sup>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2页。